

中国戏剧在印尼的发展及影响

■ 刘素娥

一、中国戏剧在印尼的发展

中国戏剧在印尼的发展与中国戏剧自身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，但在继承中国戏剧文化精髓的同时，又有其与印尼华人生活紧密相连的特殊性。

早期的印尼华语戏剧。乾隆时期，中国戏剧得到了迅猛发展。同治、光绪年间京剧形成后，中国戏剧进入了繁盛时期，随后便迅速传播到了印尼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《薛仁贵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花木兰》等，这些剧目最初以“布袋戏”的形式在印尼流传，每到节假日或喜庆日子，印尼一些寺庙常常会有这种戏剧的演出。其中，流传最广泛、影响最深远的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

1906年，印尼华人沈德美成立了一个叫“瑞万良”的戏班，演出的都是中国剧目。在这个戏班影响下，各地华人也纷纷成立剧团，经常在不同场合公演，演出内容多为中国古典剧目。印尼华人由于离开祖籍国多年，对中国戏剧在接受时往往有一定局限。印尼华人剧作家便采取创造性的手段，以印尼华人所熟悉和喜爱的传统戏曲形式灌注中国戏曲的内容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薛仁贵》等都以这种形式上演过。同时，他们还用印尼语排演中国京剧《薛仁贵》，剧中的薛仁贵被改名为“苏迪罗普罗诺”。另外，他们还曾经成功地用印尼地方戏克托伯拉戏演出京剧《薛仁贵》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在印尼从事话剧演出的华人剧团都是职业性的，演出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剧本，而是靠演员的经验自由发挥。到了1911年，出现了印尼华人慈善团体主办的业余剧团，演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发挥。也就是说，文学剧本有了一定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华人马来西亚语作家便开始了剧本创作。

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印尼华语戏剧。抗战爆发后，中国国内出现的抗战戏剧，迅速影响了印尼华语戏剧的走向。当时兴起的华侨戏剧团体有雅加达的“新艺社”，万隆的“国风剧社”，泗水的“华光剧社”，棉兰的“新中艺歌剧团”，巨港的“群声剧社”等。其成员以爱好文艺人士和青年学生为主，演出的剧目、主题和风格与中国国内抗战文化明显一致。广大剧社成员还深入到各行各业、街头巷尾、乡野农村，把反映抗战思想的活报剧、街头剧、独幕剧等最广泛地推向大众。《放下你的鞭子》是当时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目，在各地上演的场次难以数计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侵略者投降，印尼华人无不欢欣鼓舞。苏门答腊岛、三宝垄等地的爱国华侨很快建立了“新中国剧艺社”等文艺团体，主要任务是以文艺形式，宣传和推动印尼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罪行，加强同印尼民众的团结，支持印尼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等。上演的曲目有：《快乐的人们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延安颂》等。印尼独立

后，印尼当局实行和平友好的对华政策，更多的华文文化机构纷纷涌现，华语剧团大量产生，剧本创作空前繁荣，戏剧表演比赛也不断举行，中国经典剧目被译成印尼文出版，如曹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等。

1949年以后，印尼华语戏剧进一步走向成熟，公演的剧目有话剧《战斗里成长》《龙须沟》等；歌剧《兄妹开荒》《宝山参军》等；大型舞蹈《战鼓舞》《进军舞》等，都在印尼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。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华侨民族主义的高涨，各地华人华侨文艺社团更加活跃，演出剧目具有代表性的有话剧《白毛女》《屈原》《阿Q正传》等；歌剧有《兄妹开荒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刘三姐》等；闽剧有《陈三五娘》《秦香莲》《狸猫换太子》等；粤剧有《宝莲灯》《王昭君》等；京剧有《牛郎织女》《失街亭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小放牛》等；豫剧有《花木兰》等。

“冰冻”至“复苏期”的印尼华语戏剧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是印尼政治生活的大转折时期，也是印尼华语戏剧由兴盛到落寞的转折点。1965年苏哈托上台，印尼政府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推行各种限制中华文化的政策。1967年10月，印尼政府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，导致印尼华语戏剧进入了漫长的“冰冻期”。后来，印尼最高检察官发布第二十九号决定书，禁止使用和进口华语卡式录音、录影带、唱片及中国电影等。到了1983年又颁布了第十三号总统决定书，进一

步严禁华语录像带的输入和复制。

然而,即使在“冰冻期”,一些偏远地区和底层民间,华语戏剧活动也仍然存在着。有悠久传统的华人“布袋戏”演出一直很频繁。直到80年代后期,印尼当局对华文的禁令开始放宽。1990年8月,中国和印尼正式恢复外交关系,印尼华语戏剧进入“复苏期”。上台表演的多是过去受过华文教育的中老年华人。随着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好转,两国的经济、文化交流也迅速加快。近几年,中国政府对印尼的支持与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,国务院侨办确定了一批华文教育基地,用以重点发展华文教育。中国高校也在大量招收印尼留学生,还采取对口扶持的方式,对印尼教师进行华语培训。目前,华语学校和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。这些都为印尼华语戏剧的再度繁荣创造了条件。

二、中国戏剧对印尼的影响

中国戏剧在印尼的不断发展,对印尼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首先,华语戏剧延续了印尼华人文化血脉。无论在哪个阶段,印尼华语戏剧的文化认同与思想倾向,都是中国化的。中国人移民印尼已有1400年的历史。这些漂洋过海背井离乡的侨民,不论因何种原因来到印尼,始终不忘祖籍国。在异国他乡,以祖籍国的文化聊以自慰成了他们精神皈依的途径,华语戏剧的迅速发展就成为了一种必然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华语戏剧在满足印尼华人精神需求的同时,也在无形中把印尼华人的精神指向统一在了祖籍文化的大方向上,使印尼华人在认知上始终葆有中国情结。这在其生活习惯上都有鲜明的体现,仅就外在气质和服饰习惯而言,就能明显感受到华语戏剧对其影响之深。尤其是一些上流华人生活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古韵。印尼华人上流社会非常注重联谊,讲究大型活动,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万人集会。在这样的场合,男人都身着唐装,步履款款,温文儒雅;女人都长裙曳地,乌发高髻,口若含珠,细步纤纤。无论男女长幼,其语言大有古

风,常常拖着戏腔说经典古语。如:“鄙人”“高堂”“贱内”“浅见”“高见”“芳龄”等。

其次,华语戏剧构建了印尼华人精神支柱。在印尼上演的华语剧目,多为中国戏剧经典:一是反映被压迫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;二是鞭挞封建礼教残害青年男女的罪行;三是歌颂正直无私、坚韧不拔的精神;四是赞美孔孟学说所倡导的礼仪。这些内容都为广大印尼华人所喜闻乐见,同时,又对鼓舞华人在异国他乡顽强谋求生存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多年来,印尼华人在印尼虽然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,但一直难以以为印尼上层社会所吸纳。许多印尼华人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,也有一定的学养,但至今能在省级领导岗位谋职的寥寥无几,能在军界谋职的更是凤毛麟角。由此他们对刻苦顽强地谋得生存与发展有格外深刻的感受,所以他们对华语戏剧所提倡的精神倍加欢迎,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戏剧理念对他们起着支撑的作用。

抗战时期,印尼华人组织剧团公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剧目,把抗日救亡作为公演剧目的主题,使之成为了印尼华人的主流思想。

同时受华语戏剧影响,不少年轻华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变化。有的在事业上重新确立追求目标;有的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,追求企盼的爱情;有的摒弃小农意识和市井作风,去大风大浪中闯天下。

再次,华语戏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。在印尼,华族与本地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合,尽管经历了太多的风雨,仍不失为世界民族间相互交融的典范。其中,华语戏剧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。

印尼华人把中国戏剧带到了印尼,中国戏剧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也随之而来。因为在印尼上流华人家庭和华人工厂都有印尼人做工,因此华语戏剧不但在华人中有影响,也影响着印尼人,比如“梁祝”凄美的爱情故事,不但在印尼华人中家喻户晓,还通过印尼工人,在印尼原住民中也有流传。而在华语戏剧创作上,印尼华人用印尼语排演中国京剧《薛仁

贵》,以及成功地用印尼地方戏克托伯拉戏演出京剧《薛仁贵》等剧目的做法,不仅创造出了一种既中国化又印尼化的戏剧形式,更主要的是在两个民族之间找到了文化的契合点。

1955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雅加达国家宫演出时,苏加诺总统说:“你们在国家宫的第一次演出已经震动了整个印度尼西亚。”当时的印尼戏剧界与中国的联系非常频繁,印尼国或请中国剧团去印尼友好演出,或印尼本地剧团演出中国现代剧目,甚至连印尼本地的创作剧目也采取中国题材。后来印尼文艺界甚至模仿中国文艺路线,比如提倡“文艺走群众路线”等。

三、印尼华语戏剧的前景

印尼华语戏剧虽然一直在发展着,但我们在看到其发展契机的同时,也应该看到其面临的危机。一是目前印尼华语剧作家年龄偏大,出现青黄不接现象;二是观众年龄也偏大,年轻人对华语戏剧的兴趣不够高,观众也面临着后继乏人;三是当今多元化的印尼文化生活也在与印尼华语戏剧争夺阵地;四是因华语戏剧结构陈旧等不足,影响其发展指数。

然而,全球一体化观念渐入人心,各民族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融合。中国戏剧也加快了世界化进程的胜迹。近几年,中国戏剧友好演出团体不断出现在印尼各个城市,印尼华人也纷纷把子女送到祖籍国读书。印尼一些原住民为了加强同华人华侨的交往,也希望学习华语,印尼国内华语水平正在呈现迅速提高的态势。

中国戏剧在印尼的命运,可以说:机遇与挑战并存。

责任编辑/曹 吴

《大舞台》单月号 2009 第2期